月末聊斋

在新闻中看见谁的脸

■王珺

夏日的热浪如一头怪兽左冲右突，撩拨搅动着人们的心绪，令其躁动难平。

比热浪更有威力的是纷繁多变、由新闻剪辑而成的社会图景，以其或尖锐或温情的笔触刺痛或温暖着世态人心。

上世纪80年代热播的动画片《蓝精灵》走上银幕，引得一些70后、80后走进电影院重拾自己的童年记忆。英国部分城市骚乱，首相卡梅伦称英国社会生了病。美国历史上首位华裔驻华大使骆家辉足蹬休闲鞋、身背双肩包携妻儿抵京履职。还是有关美国，副总统拜登在北京鼓楼品尝京味小吃，其传递的信息当然远远超过在平民小店吃东西这件事本身。“剩女代言人”刘若英领证结婚的公告让众多大龄单身男女有点沉不住气。喧嚣了好一阵子的锋芝离婚案终于有了结果。新婚姻法关于婚前财产归个人所有的新规，一中小学性教育课题的阶段性成果被误读为首部性教育教材继而引发性教育尺度的论争……从国际到国内，从文艺到八卦，从法律到教育，光怪陆离的新闻描摹千姿百态的社会，纷繁驳杂的社会映照从这巨幅背景下走过的一张张面孔。

这些面孔表情各异，但无论上妆的还是素颜的，置于新闻的显微镜下，必须接受公众的检阅。

来自黑龙江省北安市和伊春市新青区的教育局副局长、主任、小学校长共8人，因冒充乡村教师身份参加崔永元公益基金会承办的乡村教师培训班被发现而最终遭退返，并受到当地教育部门的撤职处理。冒充并被揭穿毕竟不是件光彩事，这几位有头有脸的人士被摘下乡村教师的面具后，只能以背影示人。我们只好从新闻只言片语的描述中，例如出卖他们的手表和相机，来粗略地拼接他们的形象。这些人面目模糊，他们善于舞动权力的长袖，近水楼台先得月抢占稀缺资源。当以开阔教师视野、提高教师教学水平为旨归的培训作为一种待遇存在时，那些渴求提升的基层教师尤其是偏远地区基层教师便只能望洋兴叹。此次崔永元的较真除了引起相关部门重视并对相关人员予以处理，我们更期待各级教育部门在教师培训这件事上进行一番反思：谁更需要培训？自上而下的逐级培训是最有效的吗？怎样将培训的机会公平地分配给急需充电的基层教师？

暴雨中，一把伞撑起在残疾乞讨者的头上。撑伞的是一位姑娘，她弯着腰护送坐滑板的残疾老人回家。发生在夏日苏州街头的这个场景被路人的相机捕捉，这幅定格的画面让人想到羽泉的《最美》：“你的美无声无息　不知不觉让我追随……”尽管姑娘的脸被伞和雨遮挡，但众多读者相信这种美，并被这种温暖人心的美好所感动。

与此画面相对的，是上海一拾荒老人在公交车上遭一男乘客谩骂、被司机驱逐下车的新闻。

河南69岁的农村老太柴小女在河边洗衣服时勇救3名落水儿童，在救第4个孩子时遇难，这位普通却英勇的老人令人敬仰。但据说出事地点是那个村通往乡政府的唯一桥梁，6月被洪水冲毁后一直未得到修复，所以，有人质问：在歌颂平凡者的义举时，是否也应对相关责任人问责？当然，在新闻中，我们没有看到责任人的身影。

20多年前，少年赖宁因救火牺牲并受到表彰后，便化作一尊雕像，存在于太原市的东仓巷，被人们记得抑或遗忘。这个月，赖宁的名字和故事因这尊雕像的被搬离而被人们重新提及，并引发了赖宁精神是否过时的讨论。未成年人参与救火这类危险行为不值得提倡，但“赖宁雕像的存在就是一种残忍”的论调还是激起了大多数人的愤慨，因为赖宁作为一种崇高的象征伴随了一代人的成长，尤其在今天这个物质被无限放大、而精神却在低处的社会，人们需要通过维护赖宁的英雄形象对仅存的崇高表达敬意。在这种呼声下，赖宁雕像被重新安放在东仓巷。

本月，北京多所打工子弟学校被关停的新闻占据了大部分媒体的版面，最令人揪心的，是家长无助的眼神，他们不知道怎样才能顺利办妥公办学校的入学手续；是在校门前徘徊的孩子的身影，他们不明白为何总要不断迁移。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张脸谱，那一定是最中意、最想遇见的面孔。被新闻描绘的各色脸谱则是存在于或残酷、或温软现实之下，你必须去正视的角色。每一天，我们在新闻中遇见无数面孔：真诚的、伪善的，美的、丑的……遇见他们时，我们会在心里作个评判，并会抱着“除去虚伪的脸谱”这种美好的愿望。

表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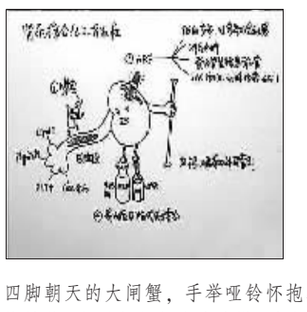
蹭课保安

保安员上大学，这个听起来让人振奋的故事来自清华大学图书馆，主人公是在那里做保安的贾作胜。27岁的贾作胜来自山东菏泽农村，高中毕业后，由于家庭经济等原因，未能如愿继续就读。在打工的几年里，他一直坚持自学，并在得知在高校当保安有比较好的学习条件后来到清华。准确的信息加上清醒的抉择成为贾作胜取得成功的前提，但定力和坚持是其凭实力考进大学的关键所在。

卖艺琴童

一个身穿纱裙的女孩，神情专注地演奏小提琴，这成了近日北京后海荷花市场附近的一景。这个9岁女孩名叫吉祥，称由于家庭出现经济困难，所以出来表演赚钱，既是为家庭出一份力，也为自己继续学琴挣学费。在搞清楚这并非家长监控孩子卖艺之后，我们有理由为这个小姑娘鼓掌，为她的孝顺懂事，为她对音乐的兴趣，为她走上街头的勇气。

涂鸦博士



四脚朝天的大闸蟹，手举哑铃怀抱小熊的蜘蛛侠，头顶水立方的玲珑塔，手拿漏斗的扑克国王……近日，40余幅医学病理涂鸦笔记在网上热传，漫画的创作者、在读医学博士舒畅也因此增加了不少“粉丝”。将艰涩的医学专业知识用形象化的涂鸦方式呈现，无异于给医科生漫长的8年学习生涯增加了调味剂，同时也让人看到博士生不欢乐不罢休的另一面。

多情男孩

1个肝脏、2个肾脏、2只眼角膜和4块半月板，这是家住深圳的13岁男孩丁思成捐出的刚刚去世的母亲的器官。他的妈妈因突发脑溢血去世。在妈妈弥留之际，这个少年想到妈妈之前曾表示，自己死后一定要把器官捐献出来。小丁用自己的决心说服了家人，在器官移植专家团队的帮助下，丁母捐献的器官被顺利摘取，并用来救助9名患者。道是无情却有情，少年用行动注解了他对妈妈的爱。

（王珺）

微观点

青少年的体质健康状况令人担忧。如北京，相当数量的学生每天锻炼时间未达到1小时，青少年肥胖率目前居全国最高。据今年上海学生体质健康调查显示，2010年与2005年相比，上海学生力量素质（握力）和女生力量耐力素质均呈下降趋势。目前，我国近视眼患病率已由全世界第三位上升为第二位。

——8月8日，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蒋效愚在“全民健身日”上说

避免沉迷网络的根本对策是做网络的主人。网络是一个工具，也是一个玩具，绝不是我们的全部，我们不能成为网络的奴隶。网络时代是以孩子为师的时代。虽然上网有风险，但是上网是当代青少年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必由之路，也是走向成功的必由之路。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副主任孙云晓发布于微博

由于现在社会的大环境很浮躁，评价（教授）的机制、导向也存在问题，甚至一些领导访问高校时只强调科技创新，要学校拿出这样、那样的成果，就是不讲拿出“人才”这个最重要的成果。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出席“世界大学校长论坛”时说

作研究不要自以为聪明，总是想些怪招，要实事求是，踏踏实实。功夫不到，哪里会有什么灵感？

数学是笨人学的，我是很笨的，脑筋“不灵”。

——数学家吴文俊谈及年轻人成长时说

对于重点大学农村生比例下降，舆论给予高度关注，分析其原因，呼吁从教育公平出发，重视这一现象，但是却对农村生更多读高职高专、三本、二本这一现实关注不够。其实，就是重点大学提高农村生比例，也无法总体改变农村生会更多读高职高专、三本、二本的情况，针对这一现实，如何提高高职高专、三本和二本学校的教育回报率，在眼下可能比关注重点大学的录取比例更迫切。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学者熊秉奇谈及日前被众多媒体关注的重点大学农村生源比例逐年下降问题时说

大多数学生的身体健康和锻炼习惯的培养，比争金夺银更重要。因为很显然，需要健康身体的人比需要体育金牌的人多得多。

——大运会期间，纽约理工大学校长爱德华·圭利亚在“世界大学校长论坛”上说

自1995年教育部开展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以来，文化素质教育作为高等学校实施素质教育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推进了教育思想观念和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和发展，但是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分离现象仍然严重。

——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叔子院士在第二届“全国高校数学文化课程建设研讨会”上说

洗脚就是尽孝吗？我不这样认为。现在的年轻人都是独生子女，很多人感到两个人养家里4个老人责任重大，这才是最本质的孝道与家庭责任感，根本就不需要把母亲的脚抱一抱才能体现。许多传统文化要放在历史的长河中看，传统文化中的孝道，讲究的是对等的尊重。

——央视《百家讲坛》主讲嘉宾、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蒙曼说

（俞水　整理）

本月瞩目

教打工子弟唱歌的异乡人

■本报记者　张东

每到寒暑假，自封为“中国孩子合唱团”团长的李昕总会有各种担心：合唱队的孩子们是否都能如期返回？孩子们所在的学校是否能顺利开学？

这个合唱团的孩子都是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这类学校和这里的学生都很不稳定。”李昕说，自己在打工子弟学校教唱歌已经6年多，每年都会有学生返乡就学，或因原学校停办而转学。他的合唱队也组了又散，散了再组。

这段时间，李昕看了许多有关北京关停打工子弟学校的新闻，他很担心作为合唱队根据地的那所打工子弟学校被停办，那样的话，合唱队也就不得不解散了。

“这些孩子连学唱歌都没办法持续下去。”李昕同情他们，但又无能为力，“我想我能做的，就是坚持义务教打工子弟们唱歌。”

这个曾经的公办学校音乐教师，为了音乐的梦想“漂”到北京，与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不期而遇，继而将自己的梦想系于这些漂泊异乡的孩子童稚的歌声中……

音乐·命运

“其实，我跟孩子们的命运是一样的，都是在偌大的北京城里漂泊的人。”李昕对打工子弟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因为，他也是这个大都市的打工者。2004年，24岁的李昕已在黑龙江省海伦市永和乡中学从事了多年音乐教学工作。但这一年，他有了新的打算，想去大城市继续学习音乐，实现音乐梦想。

当时的李昕并不了解大城市，对如何立足、如何养活自己也没想那么清楚。他唯一的想法是，“我有一把吉他。不管到哪里，只要吃上饭就行了”。凭着年轻人的自信和勇气，他揣着自己的全部积蓄500元钱，背着几件换洗衣服和一把吉他，登上了前往北京的列车。

刚到北京时，为了省钱，他住进了火车站旁30块钱一天的旅馆。尽管条件艰苦，他却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信心，打算先找个工作稳定下来，再去找老师学习音乐。几经努力，他终于在一个送水站找到了第一份工作。

一次送水途中，一辆校车从他身边驶过。他立刻放下水桶追赶，一直追到一个路口，学生下车的时候，李昕跑过去扒着车门问：“师傅，你们学校缺不缺老师？”“我们学校不缺老师。再说，现在都快放假了。”听到师傅的回答，李昕觉得浑身软了下去。他转身往回走去。“但好像缺音乐老师。”司机师傅望着他的背影喊道。李昕站住了，立刻冲回司机身边，说：“我以前就是音乐老师。你们学校在哪里？有地址和联系电话吗？”司机师傅不紧不慢地说：“要不你现在就跟我去学校吧！校长今天正好在。”李昕什么也没说，便跳上了这辆打工子弟学校的校车……

“那一刻，我就觉得自己命中注定要做老师。”6年多过去了，再次回想起这次与校车的偶遇，李昕仍会回味许久。

命运的安排让李昕又做回了教师，站回了讲台。但这次，他是一个陌生城市里打工子弟小学的临时教师。打工子弟学校的一切都像是临时的：破旧不堪的校舍，随时申请离开的教师和那些连基本学习条件都得不到保障的学生，甚至学校也随时面临着被关停。

重拾老本行的李昕发现，孩子们唱歌很卖力气，他们的生存境遇更是让他心疼：“他们跟随父母在城市里漂泊，看到的是高楼大厦、川流不息的汽车，但却生活在城市边缘。这些孩子内心的矛盾和不安都写在他们的眼睛里。”

音乐·努力

不出李昕所料，他自己也像那些流动性极强的打工子弟一样，总是被迫流动。辗转了几所打工子弟学校之后，他的谋生手段转向去酒吧赶场唱歌，但他并未远离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们，2008年，他在北京北五环外的春风打工子弟学校组建了“音乐工作坊”。

从此，李昕习惯了每个周五的中午，弹着吉他，跟打工子弟小学的孩子们一起创作、一起唱歌。不知不觉，《我想对你说》、《我的家乡》等一首首反映打工子弟生活、学习的歌曲从他的心中流淌出来。

2010年年初，春风打工子弟学校所在的社区因城区改造被夷为平地，暂住的进城务工人员带着子女迁往别处或返回老家。一夜之间，李昕变成了光杆司令。那些天里，每当他拿起吉他弹拨出熟悉的乐曲，一种莫名的伤感就涌上心头。

孩子们走了，但如何能让过去的快乐定格？如何才能让孩子们的作品不被遗忘？渐渐地，李昕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将这些歌曲录制成专辑，送给孩子们珍藏，也让社会上更多人听到打工子弟的心声。

没有资金怎么办？他想到街头卖唱来筹集。“舞台”就选在了王府井地铁通道。

迈出第一步总是艰难的。经历了内心的挣扎，四月初的一个清晨，李昕在王府井地铁通道陌生人的视线里，摆放乐谱架、海报和宣传材料，然后，抱起吉他，低声吟唱。“原来没接音箱啊，唱得真好听！”耳边传来清脆的声音。他抬起头，看到很多路人在驻足聆听。

在博客中，李昕记录了第一次走唱义捐的经历：“这一天与我对话的人有一对夫妇；有年轻情侣，过来赞叹我的歌声；有一个记者，拿去宣传资料。一个警察过来，我的演唱终止……在四五个小时中，是那些发小广告的孩子们一直在帮助我，帮我整理宣传资料，大风把钱吹走了他们帮我捡回来，他们当中的两位还捐了两元钱。”

李昕特意在专辑封面加上了一行醒目的红字：“这是一张汇聚集体力量完成的专辑。”

音乐·表达

2010年9月，李昕以昌平的智泉打工子弟学校为“据点”，成立了“中国孩子合唱团”。

跟孩子们在一起，李昕更像是大哥哥带着弟弟妹妹们玩耍。在外人看来，这样的排练太不严肃了。但这恰恰是李昕想要的效果，“音乐创作，最关键是要放松。”排练之余，李昕跟他们一起聊天，关心他们的家庭、学习和生活。他这么做，是为了让孩子们参与进来，一起创作音乐。

“在农村，人们有许多原创的音乐形式。但是来到城市以后，这些孩子和他们的父母就失去了表达自己的机会和空间。而音乐恰好能让孩子们来诉说，尽情地表达自己。这也就是我做这件事的初衷。”李昕相信孩子们可以在这个抒发内心情感的平台上创作出属于他们自己的歌曲，“在一个完全自由的环境下，孩子们也可以用自己的旋律唱出心里话”。

在专辑歌曲里，你会听到“叮叮当当”的背景声音，比专业的打击乐声音要粗糙很多。这些声音来自于孩子们的原创打击乐器。李昕介绍说：“就是锅碗瓢盆，有时还有瓶子、筷子……孩子们能想到的声音都可以加入。”这些“山寨打击乐”的声音融在一起，听起来整齐又不失节奏感，给歌曲增添了不少独特的元素。

其实，鼓励孩子们寻找、制作伴奏乐器也是李昕不得已想出来的办法。合唱团没有任何资金来源。学校角落里一间阴暗的小屋就是他们排练的地方。因为窗户被其他教室的墙壁挡着，因此即使是白天，里面也非常昏暗。至于乐器，最正规的只有他那把吉他。但他觉得，孩子们参与伴奏，能更好地融入音乐学习和创作，因此制作、挑选乐器成了合唱团的第一课。

“la-la-la-so-fa……”李昕跟随吉他弹出的曲调哼了一小段。孩子们开始敲着锅、碗、瓢、盆，按节奏摇着小沙锤，共同唱起：“我想对你说北京，初中毕业了，我要回家上学，我很喜欢你，却又要离开你，我们会努力，为你添砖加瓦……”

这首歌叫《我想对你说北京北京》。歌词由孩子们的作文改编而成。其实，整张专辑里，大多数的歌曲都是以这种方式创作而成的。在跟孩子们一起创作的过程中，李昕渐渐发觉，这些孩子的心里藏着很多秘密。

一次创作中，李昕让孩子们以《爸爸妈妈，我想对你说》为题写篇小作文。孩子们有的写：“爸爸，我想买辆自行车。”有的思考一会儿之后写道：“妈妈，您每天做两份家政工作，您歇歇吧！”但角落里的亚菲（化名）盯着本子，一直没有动笔。突然，她趴在桌子上哭了起来。

这样的突发状况，李昕习以为常了。他没有急着安慰她，而是和其他孩子一起，鼓励她把想给爸爸妈妈说的心里话写出来、唱出来。后来，李昕家访时，得知亚菲的父母曾因工作和收入问题提出过离婚，给她留下了心理阴影。

合唱团里，没有城市的喧闹，没有父母的争吵，没有老师的管教，孩子们完全沉浸在音乐中，用歌声表达着内心的感受和想法。这些原创歌曲，反映了打工子弟们在大城市里看到的、想到的、害怕的、担心的……

对于合唱团的未来，李昕说，“打工子弟音乐教育会贯穿我在北京生活的始终。只要我不离开，我会一直带孩子们唱歌。”

关注

“鲶鱼”饶毅“出局”之后

8月17日，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初步候选人名单发布：饶毅出局。

即日，饶毅在博客上发表声明，从此不再参选院士。此举激起千层浪，使得原本宣称永做院士增选“局外人”的饶毅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无法真正“出局”——媒体的高度关注下，饶毅的名字与院士增选之间产生了一种微妙联系，不仅其落选原因引来诸多猜测，其牵扯出的中国科研体制之弊病也一时成为媒体与公众热论的议题。

饶毅，国内生命科学界的领军人物之一。2007年，45岁的他从美国西北大学归国，出任北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此前，他任美国西北大学讲席教授、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作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美国取得终身讲席教授职位后第一个全职回国工作的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他的回归在当时引起轰动，被认为是“中国科技界吸引力增强的标志之一”。而这并不是他贡献中国科研界的起点，早在1995年，饶毅就开始帮助中国的生命科学发展，至今，在中科院上海神经所和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建设中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正是这样的背景下，有人认为饶毅“第一轮就被刷纯属侮辱”。

此事件如此敏感更为主要的原因，是饶毅的“鲶鱼”特性。在圈子里，饶毅“爱说话”是出了名的，被媒体称为中国科学界的“鲶鱼”。对于这位神经生物学家，公众更熟悉的不是他研究的领域，而是他大胆、犀利的言论。

早在2004年，《自然》杂志中国特刊上就刊登了饶毅、鲁白、邹承鲁3位科学家共同撰写的《中国科技需要的根本转变：从传统人治到竞争优胜体制》。文中写道：“没有根本的变革，中国科技进步就会被体制延缓。”回国后，饶毅仍不改“大嘴巴”本色，常在各种场合直截了当批评中国科学界的浮躁风气，更多次在媒体发表文章痛陈此中沉疴。2010年9月3日，饶毅与同样从美国归来的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联名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批评中国科研经费分配制度。文中说：“在中国，为了获得重大项目，一个公开的秘密是，做好的研究，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就在今年8月15日，院士增选的敏感时期，饶毅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呼吁“在对科学工作者增加支持的情况下，降低职称”，以改善科学界的浮躁。

正因为此，有人断定，饶毅“言多必失”，遭遇了“潜规则”，正如他曾抨击的现实。

几乎所有媒体都注意到了一个饶有意味的细节。在那段只有200余字的声明末尾，饶毅写道，“2011年3月5日写，2011年8月17日添加日期”。这成为饶毅“蓄谋已久”的佐证。饶毅说：“这个博客是我3月写的，预计到自己不会当选。”有媒体评价，饶毅以一种隐含的幽默向人们展示了自己的预言能力，有一些与自己打赌胜利的俏皮，也有从此在系统外自立门户的悲壮。也正是这个举动，更加刺激了人们探究其落选真相的欲望。

最初，饶毅的解释是“任何学生物的人都会知道原因”，但关心此事的多数人并不是学生物的。中科院也一直拒绝对此事进行评论。不过，饶毅就是饶毅，虽没有直陈要害，但还是放出了一些狠话：“总有人认为他是趴着进去的，你就会和他一样也趴着进去。”“我可能话多一点，这可能是一个因素，但不是唯一的，不说话照样被冷藏、打压。”对于院士制度，他更是直言，当了院士以后，做科学的时间和精力大为减少，科学活跃期结束得比较早。饶毅对自己的初衷也直言不讳，“也许这样做了，对改变风气有一定促进作用”，让国外有些正教授、博士后“有勇气回来，告诉他们不是回来就一定要拍马屁的”。

饶毅的论调，被很多人解读为他具有可贵的批判精神。有媒体评论，饶毅留在院士体制外反倒是幸事。他的出局至少是一面镜子，证明当下的院士选举存在制度缺陷。与此同时，也有人认为，暂时收敛一下，评上院士拥有更大话语权，此后的呼吁更有利于科学界环境的改良。此两种观点虽有不同，但其前提都是认为饶毅的确受了委屈。

也有人向饶毅提出质疑。有媒体评论称，从314位有效候选人到145位初步候选人，淘汰比例从数字上可见一斑。只要参选，就有可能落选，落选概率远远大于最终的当选概率。从此意义上讲，谁也不能说饶毅就不能落选。学术评价是极为复杂的事情。中科院院士、理论物理学家何祚庥表示，院士评选要求首先是科学水平，但最重要的一条是对提高中国科学是否起重要作用，这个评判标准本身就很复杂。

对于饶毅退选引发的公众对院士制度的关注，一位77岁的老院士言辞中肯地说，媒体和社会公众对院士的关注太多了，过度围观只会害了学术圈。人们对此事的态度越是平淡，两年一度的院士增选越有可能做到公平公正。

其实，对于院士制度，饶毅自身的态度比他身后的“鸣冤团”理性很多。“我并不想彻底否定院士制度。它的存在有它的道理，而且还要存在很久。”“这就像高考，里面肯定有问题，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制度，还有更好的吗？”

事态发展至今，对于自己这一次的“鲶鱼”举动，饶毅似乎也感到大家的反应有点大，“我的事属于搞得太明显了”。记者截稿前，他在最近一次更新的博客中写道，这引起了出乎他本人意料的关注，希望避免继续过度解读，应该将其中无意义的部分转化为较有意义的事情。

（本报记者俞水综合自《中国新闻周刊》、《新京报》、《中国青年报》等）